

# 辛亥革命的历史启示

赵瑞芳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一百年前(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君主专制统治下的漫长岁月里,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它象一付万分沉重的锁链紧紧地束缚着人们。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赴后继。然而,在孙中山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最高峰,结果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等于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虽提出“爱国救亡”,但他们把“爱国”与“忠君”等同起来。从国际上来看,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和美国,而英国、日本、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沙皇俄国都还保留着君主政体。康有为还说:要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

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孙中山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sup>①</sup>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奋斗目标之一。第二年冬季颁布的《革命方略》郑重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

---

作者简介:赵瑞芳(1929—),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sup>①</sup>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了不得的惊人之语！对比封建专制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简直是天壤之别！

20 世纪的中国，处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威胁时刻萦绕在爱国者的心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而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满清政府媚外辱国、倒行逆施，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实际上已变成了“洋人朝廷”。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sup>①</sup>就是说，革帝国主义的命，就要革封建主义的命，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满清政府，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

反满，这是满清入关后深藏在广大遭受满清统治者欺压的群众心中的火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主危亡，维护国家独立，争取民族复兴，提出“反满”这一口号，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党人在中国腹地湖北武昌发动起义，一个月内，10 多个省相继响应，一切对满清政府不满的人们或先或后地汇集到了这个全国性的反满浪潮中来，形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满联合阵线。1911 年 12 月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 年 1 月 1 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诞生。1912 年 1 月 28 日，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成立。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

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激发了除旧布新的建设热情，短时间内，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南方各省，社会

<sup>①</sup>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517 页。

政治生活变得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出现了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各种实业协会勃兴，创办工矿、交通、金融企业成风，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变化，男子剪辫，女子放足，……这一切，充分显现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生动画面。孙中山说：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为主人矣。”<sup>①</sup>

然而，革命的画卷迅速展开，又迅速卷起。乘势而起的袁世凯为了攫取反满斗争的胜利果实，他挟清室以牵制革命党，又利用革命党以威逼清室。对此，革命党人很少戒心。孙中山当时最大的隐忧是，如果清室不肯退位，一旦得到外国援助，革命将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他认为：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及早退位，是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一步。在革命风暴的打击下，在袁世凯军阀势力的威逼下，清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袁世凯为博得信任，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肯定“共和为最良国体”，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孙中山于2月13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举袁世凯代之。参议院2月14日议决接受孙中山的辞职，2月15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为防范袁世凯搞军事独裁，复辟帝制，革命党人曾用了两个办法：一是提出把首都定在受过革命洗礼的南京，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力量的监督下，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二是制定《约法》，要袁世凯遵守。对第一点，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表示：“现在统一组织至重至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此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诸君洞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孙中山见此电文，只好于3月6日向参议院提出“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经

<sup>①</sup>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页。

参议院议决通过，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为防范袁世凯专权独裁的迫切需要，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经参议院议决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实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对此，袁世凯施展阴谋，于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又解散国会，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

革命党人为什么不能保持政权？首先，南京临时政府饷械无着，缺乏支持；资产阶级只在短时间内支持过革命党人，但在民国建立后就不再支持；农民没有在革命中得到实惠也不支持，孙中山虽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所有文件中都未提到；海外华侨曾给革命运动大力支持，但在武昌起义后就不再提供有力支持了；地主买办阶级自然不会支持；帝国主义者则早已选定袁世凯做他们的代理人，给袁世凯很大的财力支持。失去支持的革命党人及其领导的政权便无法抵御拥有较大实力的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攻势。另外，不少革命党人认为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革命就算完成了。特别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后，多数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就此结束。而对革命胜利后面临的复杂斗争缺乏思想准备，所以，无论从革命党人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革命党人的政治经验看，失去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论在辛亥革命前进行的斗争或是在失去政权后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并非仅仅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后断

然决定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相结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才可能具有的胆略和胸怀，这是在从事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说：“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sup>①</sup>孙中山深知在中国坚持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艰巨，路程漫长，因而在临终前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它却改变了传统中国“改朝换代”的格局，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法制的转变。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不仅彰显了“主权在民”、“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从而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后，尽管中国政权几经更迭，政治舞台潮起潮落，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震荡。经过维新与守旧，革命与保皇的反复较量，民主共和，法制观念日愈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就连尊崇君主立宪政体的梁启超也感叹道：“共和之局既定矣。”<sup>②</sup>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说：“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维度：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sup>③</sup>辛亥革命前，中国实行的是“神权政治”，“君权神授”的皇帝拥有无限权力，谁敢稍有违抗，就被视为“犯上作乱”，就要“天诛地灭”。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基本上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用“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取代了“天命王道”的传统合法性。共和政体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页。

<sup>②</sup>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7页。

<sup>③</sup>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7页。

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大大扩展了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有利于吸纳和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到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来。

总结经验，回望历史。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启示是：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事实正是这样，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赢得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时至今日以至永远都将受到人们的尊崇、爱戴，中国共产党将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袁世凯玩弄权术，虽曾得势于一时，但他背弃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灭亡。至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过一百年的磨砺，已经逐渐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我们仍应时刻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参考文献：

- [1] 林增平 郭汉民 李育民编：《辛亥革命》成都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 [2] 金冲及 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3] 张开沅 田彤：《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00-2009）《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9 期。
- [4] 何新：《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参与的扩大》《理论观察》2010 年第 3 期。
- [5] 彭南生 朱英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笔谈，《史学月刊》2011 年第 4 期。
- [6] 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红旗文稿》2010.10
- [7] 王宜秋：《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次伟大革命》《红旗文稿》2009.22
- [8] 朱英：《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
- [9] 刘国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新探》《天中学刊》2010 年 8 月第 25 卷第 4 期
- [10] 张磊 张萃：《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纪念同盟会建立 100 周年 《江海学刊》2005 年第 6 期
- [11] 李玉胜 孙孝科：《辛亥革命：中国政治现代化闸门的开启》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 5 月第 29 卷第 3 期